



The Politics in Ordinary People's Discourses
A Study on Peasants' Political
Psychology in Transitional China

普通人话语中的政治

转型中国的农民政治心理透视

刘 伟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普通人话语中的政治

| 转型中国的农民政治心理透视 |

刘 伟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普通人话语中的政治：转型中国的农民政治心理透视/刘伟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1

ISBN 978 - 7 - 301 - 26474 - 4

I. ①普… II. ①刘… III. ①农民—政治心理学—研究—中国
IV. ①D42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59693号

- 书 名** 普通人话语中的政治：转型中国的农民政治心理透视
Putongren Huayu Zhong de Zhengzhi: Zhuanxing Zhongguo
de Nongmin Zhengzhi Xinli Toushi
- 著作责任者** 刘伟 著
- 责任编辑** 高桂芳
-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26474 - 4
-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 网 址** <http://www.pup.cn>
- 电子信箱** zyjy@pup.cn
-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4934
- 印刷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965毫米×1300毫米 16开本 16.75印张 256千字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 定 价** 45.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目 录

Contents

| | |
|-------------------------|-----|
| 导 论 | 001 |
| 一、研究缘起 | 001 |
| 二、问题意识 | 003 |
| 三、研究进路与范式反思 | 004 |
| 四、已有研究的不足 | 016 |
| 五、研究方法与访谈对象 | 020 |
| 六、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026 |
| 第一章 中国农村地区的治理转型与合法性基础变迁 | 029 |
| 一、政治合法性理论及其适用性 | 029 |
| 二、农村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变迁 | 031 |
| 第二章 治理转型背景下的农民政治心理(上) | 046 |
| 一、政治认知 | 049 |
| 二、政治情感 | 081 |
| 三、政治信任 | 101 |
| 第三章 治理转型背景下的农民政治心理(下) | 115 |
| 一、政治评价 | 115 |
| 二、政治期待 | 140 |
| 三、政治人格 | 151 |
| 第四章 农民政治心理的结构紧张 | 156 |
| 一、认知局限与反思能力缺乏 | 156 |
| 二、主导观念与治理现实紧张 | 159 |
| 三、情感化与理性化的不平衡 | 161 |

| | |
|------------------------------|-----|
| 四、个体化与公共性的不平衡 | 162 |
| 五、自由度与主体性的不平衡 | 165 |
| 六、代际、阶层与干群差异性 | 167 |
| 第五章 基于农民政治心理,促进乡村政治发展 | 172 |
| 一、重塑农民的基层政治信任 | 173 |
| 二、重构基层的治理与自治 | 175 |
| 三、重建国家、精英与农民的关系 | 177 |
| 四、以政治建设促进农民现代化 | 181 |
| 余 论 农民的政治心理与中国人的政治心理 | 186 |
| 附 录 | 190 |
| 一、访谈提纲 | 190 |
| 二、访谈对象基本情况一览表 | 193 |
| 三、基本问题回答简表 | 205 |
| 四、1978 年以来中国主要的涉农文件 | 231 |
| 五、对于村里的发展还有什么想说的? | 233 |
| 六、对于中央和县乡政府还有什么想说的? | 242 |
| 七、时代评价的影响因素分析 | 249 |
| 参考文献 | 252 |
| 后 记 | 262 |

导 论

一、研究缘起

长期以来,中国都是作为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而存在着。这其中,众多的小农构成中国社会的主体,乡土性成为中国社会的底色。^①乡土性不仅成为理解乡村社会的关键概念,也成为理解中国农民群体直至普通中国人的关键概念。而就政治统治与乡村治理而言,传统乡村处在“皇权—官僚”体系治理的最末端,其中的农民形成了独特的政治人格和政治思维倾向,如皇帝情结、崇拜权威、渴望清官、求稳拒变,等等。但近代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受到现代化进程的冲击和改造,乡村社会的内在结构发生着深刻变化,乡村的精英和普通农民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模式也发生了或深或浅的嬗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社会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显然,这种变化更多地是由执政党与政府主导和推动,并通过政策变革实现的。虽然也有社会和市场自发演进的因素在其中,但中国乡村的变革和农民群体的变化更多受到外力的拉扯和裹挟。因此,这一变化过程显得比较突兀和急切。身处巨变之中的农民,其观念和行为模式与表面上日益现代化的政治社会环境往往存在着诸多不协调,却又在

^①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的开篇“乡土本色”中这样写道:“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句话对理解“乡土中国”极具概括性。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梁鸿也认为:“乡土中国不仅是地理意义的农村,而且是整个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特性。”(梁鸿:《中国在梁庄》,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93页。)

深层与后者存在着互相依赖的共生关系。这一悖论现象需要我们的解释。否则,我们就无法阐明转型期中国乡村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也无法揭示乡村社会特别是其治理领域存在的诸多尴尬和困境。

当前我国的乡村社会,不仅向国家政权全面敞开,而且向市场和城市全面敞开。在此背景下,农民对政治(国家)诸面向的想象、情感、看法和期待到底是什么样的?在由城市、权力和知识精英操纵的各类话语幻像下面,这些“没有声音”的人群到底是怎么思考我们的国家(政治)和他们所面对政府(政治)的?一般的看法都强调,当前中国正处于一个转型时代,农民的政治心理存在传统性和现代性交叠的格局,但缺乏有说服力的实证材料来证明。因此,有必要让历史演进中的普通个体自己说话,我们则进入他们的观念世界,理解他们的政治想象和期待,以作为理解庞大中国的心理基础,也作为我们反思未来中国政治转型路径的前提。

上述这些判断和设问的形成,缘于本人长期以来的调查和研究。1997年,我开始尝试乡村调研。当时调查的主题是颇为“热闹”的“村民自治”问题。1999年,我开始发表乡村研究方面的调研报告和学术论文,其中就发现影响村级民主建设的诸多经济因素。^①自2005年起,围绕博士论文的写作,我组织了近三年的乡村持续调研,其中已涉及农民政治心理的部分内容。研究发现:在不同类型的村民群体性活动中,农民的心理特征呈现差异。一方面,村民总体上对群体性活动尤其是涉及村落公共事务的活动信心不足;另一方面,村民对各类精英的期待与精英现实之间存在落差,村民对现有精英的信任不足,并在一定程度上期待不同类型的自生性精英;而从内在的信任和观念结构上挖掘,可以发现,村民当前的信任状况既延续了传统村落的差序特征,又呈现着转型期村民与外部世界(包括国家)的新型关系的可能。^②

2009年,我出版了乡村政治方面的研究专著——《难以产出的村

① 刘伟:《浅析经济因素对村级民主建设的影响》,载《中国农村观察》1999年第4期。

② 刘伟:《群体性活动视角下的村民信任结构研究》,载《中国农村观察》2009年第4期。

落政治》^①,对村民的信任和行为模式展开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并将这一分析与乡村政治秩序的构建联系起来。这为我后续的农民政治心理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我持续积累农民政治心理方面的深度访谈材料。每学期我都遴选一批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本科生,进行阅读积累和访谈方法上的训练。然后,利用每年的假期(主要是寒假和暑假),在自己的家乡作深度访谈。^②经过四年的积累,访谈材料已经有200余万字。其中蕴涵的丰富信息和共同倾向,一直激发着我对农民政治心理的持续思考。

二、问题意识

政治心理作为政治体系得以维系或变革的重要基础,在政治学研究中往往被视作“民情”^③的一部分。社会各阶级、阶层和群体的政治心理状况,直接影响着政治体系的精神气质和运作绩效。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农民群体及其个体的政治心理对政治体系同样是至关重要的。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大国和农业大国来说,农民群体作为主要的阶层构成和社会力量,他们的政治心理状况、由来及其效应,更是对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起到基础性的作用。但是,对于诸多研究者来说,农民要么是政治世界之外的人,因为政治往往被界定为少数精英甚至是宫廷的事;或是政治世界的边缘人,因为农民即使参与政治也只是处在边缘的位置;要么只是政治过程中的被动方,农民只能被政治影响而不能主动影响政治;甚至是应该予以批判的对象——他们身上集中地体现了我们民族身上的“劣根性”。这一状况自中国共产党推动农民革命以来逐步得到了部分改变,但那时农民主要是作为

① 刘伟:《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对村民群体性活动的中观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② 2009年的暑假,围绕建国六十年对农民政治心理的影响,我还另外组织了一批调查员对湖北省红安县的村民作了比较集中的访谈。

③ 关于民情及其与民主共和制之间的关系,国内学界最常援引的经典论述是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对民情的界定:“其含意与其拉丁文原字 mores 一样。它不仅指通常所说的心理习惯方面的东西,而且包括人们拥有的各种见解和社会上流行的不同观点,以及人们的生活习惯所遵循的全部思想。因此,我把这个词理解为一个民族的整个道德和精神面貌。”参见:[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32页。

政治动员的对象而被整体研究的。

如果要研究影响中国政治进程的观念和思想,知识分子们更愿意选取已有的正式文本来分析。^①但是,一方面,普通农民并没有书写的机会,即使有,那也是极个别的。^②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即,经历了近代以来的政治社会变迁,农民无论作为群体还是其个体,都越来越与外部世界的政治活动发生着直接的关联,也就具有愈加不可忽视的政治能动性,农民作为“政治人”的色彩也越来越深。特别是,经历了建国以后一系列深刻的政治社会转型的农民,他们现在到底采用什么样的概念(语词),以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基于什么样的道德原则,持什么样的心态和情感,来表述政治,看待政治,分析政治,评价政治和期待政治的?是哪些因素造成了这一系列的心理倾向?又是怎样造成的?国家不同时期的乡村治理模式(体现为不同时期标志性的涉农政策),在普通农民的人生历程中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为什么造成了这种影响?这种影响对我国已有的乡村治理产生了哪些影响,又将对未来我国的乡村治理和政治发展构成什么影响?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都应予以严肃探讨。而在展开实体性的研究之前,回顾并反思现有的相关研究是必需的。

三、研究进路与范式反思

1978年全面改革从农村开启之后,随着国家与农民关系的不断调整,农民群体在乡村治理转型的大背景下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才逐渐

① 这方面的代表作是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在该书中,作者建立并利用含有一亿两千万字文献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以关键词如“权利”“个人”“公理”“民主”“社会”“科学”“经济”“革命”等政治术语的统计分析为基本素材,并辅以相关的统计图表,探讨它们对应的西方现代政治观念在中国的引进、演变以及定型过程。显然,不了解这些重要政治观念,就无法理解支配20世纪中国人的思想以及意识形态的建构和变迁方式。但是,他们所分析的毕竟是书面语言,普通中国人的所思所想、所运用的词汇和表达方式,与书面语是存在重大差别的。

② 因为有历史学者、报告文学作者和人类学或社会学者的介入,部分普通农民或乡村精英的话语进入到知识分子的书面写作中。如黄树民人类学著作中的“叶书记”。也有极个别的农民或乡村精英保持着写作的习惯,他们的记录在适当的时机也得以发表,并为知识分子所研究。如侯永禄:《农民日记——一个农民的生存实录》,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

从学术上吸引着来自不同学科研究者的极大关注。国内外学术界围绕农民政治心理的具体问题,先后展开了相关的学术研究,共同构成了这一研究论题的学术积累。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术界逐步聚集了围绕我国农民政治心理的大量研究文献。在这个背景下,回顾和反思既有的研究进路和研究范式,总结既有研究的成绩与局限,对于推进和深化我国农民政治心理的学术研究将是必要而及时的。而至今为止,学界除了少量的呼吁^①,尚未有围绕这一主题的系统性反思。

1. 研究进路

针对农民群体的学术研究,首先就意味着研究者的到场,即以某种方式与农民发生联系。在现代社会科学的意义上,对农民政治心理的学术研究首先应该是实证性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梳理出1978年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相关的研究文献。而从学术研究的脉络上分类,关于我国农民政治心理的研究文献,大致是沿着三条不同但又有所交叉的学术进路展开的。

第一条是社会心理的研究路数,在社会心理学的学科背景下部分触及农民社会心理中的政治面向。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进路,往往强调以群体或阶层为分析单位,致力于对一个社会中具有普遍性的心理趋向和心理逻辑的挖掘,农民个体本位的分析相对薄弱。现有研究中一部分是基于历史演变的视角所作的社会心理分析,对理解当前我国农民的政治心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如张鸣对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作了初步的分析,其中涉及农民传统政治心理的近代嬗变逻辑^②;又如周晓虹也从社会心理嬗变的视角对江浙农民作了一个历史性的综合研究^③,其中也部分涉及农民政治心理的一些面向;对建国后我国农民社会心理的深度研究,目前只有少数的几篇学术论文,

① 刘伟:《农民政治心理研究亟需深化》,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8月26日。

② 张鸣:《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

③ 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76页。

其中以郭于华、孙立平的“诉苦”研究^①和郭于华的“心灵的集体化”^②之类的口述史研究为代表,这些研究具有相当的深度,学术发现也非常新颖,但只能解释建国后我国农民政治心理的形成机理。另一更为重要的部分,即是本土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相关研究。对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本土化呼吁早已成为国内外相当多学者的共识^③,但我国真正的本土社会心理学研究,特别是相关的经验研究则是比较晚近的。这场滥觞于海外的华人学术运动,后来影响到国内众多比较有影响的社会心理学者。这一脉络下的相关探讨,往往承续经典研究中的“差序格局”^④和“伦理本位”^⑤等命题,试图回应不断转型的当前中国社会。他们强调在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现实情境中研究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逻辑,部分涉及农民的社会心理。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进路中,一般都会涉及主体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但社会心理学的关注范围显然要广泛得多,政治心理只是其中的一个问题,而且遵循着社会心理的大逻辑。除了极个别的研究文本,一般的社会心理学著作对农民政治心理自身的独特面向和机制都未能充分呈现。因此,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进路,可以构成农民政治心理研究的背景和基础,但不能替代明确聚焦于农民政治心理的学术研究。

第二条是乡村政治的研究进路,即立足于乡村政治与治理,从乡村政治的研究框架和学术传统出发,部分触及农民的心理与行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乡村政治研究日益成为“显学”。在此背景下,部分三农学者、社会学者、政治学者和法学研究者直接聚焦于村民自治和乡村治理过程,触及农民心理与行为逻辑,并产出了大量的学术作品。乡村政治的研究进路中,涉及农民权利观念的研究比较集中。在此方面,李连江发现,自由公正的选举的引入,激

① 郭于华、孙立平:《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载《中国学术》2002年第4辑。

② 郭于华:《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骠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③ 黄光国:《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巨流图书公司1988年版;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杨国枢、陆洛:《中国人的自我:心理学的分析》,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杨中芳:《如何研究中国人:心理学研究本土化论文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④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

⑤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3—89页。

活了农民的权利意识,提高了他们的政治效能感。^① 欧博文和李连江提出了“依法抗争”的概念,强调农民上访告状不再局限于经济利益,而是进一步要求依法保障他们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监督权和罢免权等政治权利。^② 在村民参与选举的动机上,乡村政治进路下的相关研究也比较集中。学者们大都肯定,经济利益是农民政治参与的基本动机。徐勇认为,支配和影响村民选举的因素主要是利益机制,其中的利益既包括集体公利、小团体共利,也包括个人私利。^③ 何包钢和郎友兴的研究则发现,选民对投票回报或选举的误工补贴的期望是村民高参选的重要因素。^④ 胡荣的案例研究则强调了农村选民的经济理性选择特征。^⑤ 海外学者也大多从经济发展与民主参与间关系的角度探讨农民政治参与的动力和动机。^⑥ 也有从非经济因素来探讨农民政治参与动机的。如于建嵘在湖南的调查就发现:参加选举的农民并不认为选举投票对他们的自身利益很重要,他们寻求的是“做事公道”^⑦。郭正林的实证研究也发现,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的因素开始呈现出非经济性的特征。^⑧ 总的来看,已有的乡村政治与治理研究,虽然也有部分涉及某些层面的农民政治心理,但未能系统呈现农民的政治心理逻辑。而随着我国乡村社会的深刻变化,社会自我管理和政府对社会的治理都将作出某些调整,这都要考虑到农民政治心理的复杂现状及其变革方向。进一步系统地把握农民政治心理的结构与机制,是适应我国乡村治理转型的需要。

① Lianjiang Li, “The Empowering Effect of Village Elections in China,” *Asian Survey*, Vol. 43, No. 4, 2003, pp. 648—662.

② 李连江、欧博文:《当代中国农民的依法抗争》,载吴国光:《九七效应》,(香港)太平洋世纪研究所1997年版。

③ 徐勇:《利益与体制:民主选举背后的变数分析》,载《徐勇自选集》,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8—299页。

④ 何包钢、郎友兴:《寻找民主与权威的平衡》,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3—165页。

⑤ 胡荣:《理性选择与制度实施》,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第57页。

⑥ Oi, Jean C. & Scott Rozelle, “Elections and Power: The Locus of Decision Making in Chinese Village,”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62, no. 2, 2000, pp. 513—539; Shi, Tianj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Village Elections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8, no. 22, 1999, pp. 425—442.

⑦ 于建嵘:《岳村政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15页。

⑧ 郭正林:《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程度、动机及社会效应》,载《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3期。

第三条是政治学新兴学科政治心理学的研究进路。在政治心理学的诸多研究议题中,领袖、精英、族群、群众等问题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农民群体一般作为阶层的一种而被讨论。^①从表面上看,政治心理学的话语体系主要是基于先发国家的政治实践,若要适用于对我国农民的研究,则需要一个转化的过程。但是,政治心理学中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政治评价和政治人格等基本概念,无疑还是为农民政治心理的实体性研究准备了现成的概念工具和基本理论。政治心理学中的群众心理、阶层政治心理、政治社会化等主题,也更能直接地为我们探讨中国农民政治心理的某些切面提供理论资源。运用政治心理学的学理资源,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政治心理的研究,一部分混杂于总体性的政治心理或政治文化的实证研究中,如对中国政治文化^②、中国公民政治意识^③、公民文化^④、群体心态^⑤、各阶层政治心态^⑥、中国民意^⑦、中国民众政治支持^⑧和政治参与的社会心理^⑨的综合性研究。这类研究旨在探究中国民众总体或结构性的政治心理,限于篇幅和分析框架,对农民的政治心理大都未能展开深入探究,而且大部分研究都已比较陈旧,不能反映当前我国农民的真实状态,所选取的样本代表性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另一部分则主要是从政治文化^⑩、政治

① 参见尹继武、刘训练:《政治心理学》第七章,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② 闵琦:《中国政治文化——民主政治难产的社会心理因素》,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楚成亚、徐艳玲:《变迁、分化与整合: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实证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③ 张明澍:《中国“政治人”——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张明澍:《中国人想要什么样民主:中国“政治人”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④ 严洁等:《公民文化与和谐社会调查数据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⑤ 黄建钢:《政治民主与群体心态》,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

⑥ 孙永芬:《中国社会各阶层政治心态研究——以广东调查为例》,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

⑦ [美]唐(Tang, W. F.):《中国民意与公民社会》(胡赣栋等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⑧ [美]陈捷:《中国民众政治支持的测量与分析》(安佳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⑨ 王丽萍、方然:《参与还是不参与: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社会心理分析》,载《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2期。

⑩ 于毓蓝:《农村基层民主的政治文化分析——苏南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亚文化^①、民主意识^②等角度展开的专题式研究。除了个别针对农民政治价值观的全方位研究^③,大部分研究都未能基于乡村本位和农民本位展开比较全面和有历史纵深感分析。其他涉及农民政治心理的专题研究,比较有影响的多集中到农民的政治信任研究^④或政治认同研究^⑤,但除了信任和认同,农民政治心理显然还有其他同样重要的方面。总体上看,现有的政治心理进路的农民政治心理研究,政治学色彩和学术前沿性都比较强,但关注的话题仍然显得比较零散,对农民政治心理内在的系统性构成呈现不够。

2. 范式反思

前文对研究进路的总结,仍是粗线条的。在不同的研究进路和交叉的研究进路下,研究者们凝练出了具有后续对话价值的研究范式。范式意味着相应的核心概念、基本假设、研究框架和价值取向。总结国内外思想界和学术界对我国农民政治心理的相关探讨,可以发现如下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范式。

其一,国民性(批判)范式。对中国学术界来说,“国民性批判”是清末以来在启蒙话语^⑥之下的一个主导范式。该范式滥觞于早期来华

① 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李艳丽:《政治亚文化:影响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特殊因素分析》,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② Yang, Zhong, *Political Culture and Participation in Rural China*, Routledge, 2012.

③ 肖唐镖、余泓波:《农民政治价值观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五省(市)60村的跟踪研究(1999—2011)》,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④ Li, Lianjiang and Kevin J. O'Brien, "Villagers and Popular Resist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Modern China*, Vol. 22, No. 1, 1996, pp. 28—61; Bernstein, Thomas P. and Xiaobo Lü,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Peasants, the Central and the Local States in Reform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63, no. 3, 2000, pp. 742—763; Shi, Tianjian, "Cultural Values and Political Trust: A Comparis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aiwan,"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33, No. 4, 2001, pp. 401—419; 胡荣:《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村居民的地域性自主参与——影响村民在村级选举中参与的各因素分析》,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肖唐镖、王欣:《中国农民政治信任的变迁——对五省份60个村的跟踪研究(1999—2008)》,载《管理世界》2010年第9期;刘伟:《群体性活动视角下的村民信任结构研究》,载《中国农村观察》2009年第4期。

⑤ 彭正德:《生存政治——国家整合中的农民认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⑥ 关于中国近代以来的启蒙话语反思,参见张光芒:《启蒙论》,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的传教士基于他们的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民众所作的反思性观察。其中既有温和而客观的描述者,也有激烈的偏见和批判。明恩溥是其中的代表,他作为美国公理会教士,于1872年来到中国传教,通过对中国各阶层人士特别是底层农民生活的观察,写出了著名的《中国人的素质》。^①该书开创了研究中国国民性的先河,是第一本具有社会学性质的著述,对后世学人影响极深。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以来,越来越多留学归来的文人和知识分子,包括部分政治家,基于对中国积贫积弱的焦虑,试图从文化上寻找答案。这其中,比较著名的论断,首当其冲的就是梁启超作出的。他认为,中国国民性格的缺点包括“公共性之缺乏”与“自治力之欠缺”^②,中国传统伦理也偏私德而轻公德,因为所谓的五伦之中,三伦纯属家族伦理,朋友和君臣则为极不完全之社会、国家伦理。^③孙中山所讲的中国人“一片散沙”^④,特别是鲁迅先生对中国人“奴性”的挖掘、揭露和批判,更是成为中国国民性批判的代表言论。^⑤这种国民性批判的观点,依据的大都是他们对农民群体的观察和思考,因为当时中国人的绝大多数都是农民。但若作反思即可发现,国民性批判从一开始就具有殖民主义的话语霸权色彩。同时,由于充满着文人的激越和批判的取向,他们对农民政治心理的某一层面予以放大,未能平和而系统地分析农民政治心理的状况及其成因。中国知识分子对本国国民的“国民性”批判,具有明显的精英主义立场和“他者”心态,具备审视的高度,却缺少理解的丰满。新中国建立以后,文学作品中农民性的呈现,也可以归入这一思想

① 笔者认为,严格地讲,将 characteristics 翻译为“素质”并不如翻译为“国民性格”好。

② 梁启超:《论中国国民之品格》,载《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③ 梁启超:《新民说》,载《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④ 参见孙中山的著名讲话:“用世界上各民族的人数比较起来,我们人数最多,民族最大,文明教化有四千多年,也应该和欧美各国并驾齐驱。但是中国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团体,没有民族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的地位在此时最为危险。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来救国。”(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21页。)

⑤ 虽然也有部分文人如林语堂基于一个比较平和的立场来分析中国的文化和国民性,但这种看法在国内显然是被批判的声音掩盖着。林语堂对中国人的剖析集中体现在他的《中国人》(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中。

脉络中,但在立场上由批判转为肯定和理解,看到了农民意识的复杂性。^①但直到现在,仍有不少人文主义取向的学者,秉持国民性批判的范式来看待中国农民的政治心理。

实际上,抛开激越的批判锋芒,如果我们承认每一社会都有其特定的文化类型,我们也能发现每一政治体系中,其成员所具有的众数人格或心理。这就是比较中立客观的“国民性”研究了。在这一点上,人类学家往往有更为深刻的把握。如美国的本尼迪克特就提出了“文化模式”的概念,这是一个整体性和共通性的概括。她认为,文化模式是相对于个体行为来说的。一个部落、一种文化在人类行为的无穷可能性里,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些,而这种选择有自身的社会价值趋向。在此理论上,她写出了经典之作《菊与刀》,深刻地描画并分析了日本人的国民性,其中涉及日本人对权威和等级的心理机制。如果说本尼迪克特的研究更多地具有人类学的色彩,那么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则直接致力于国民性(national character)研究的社会科学化。他采用现代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通过经验调查和态度测试,对不同国家的国民性展开了研究。他所研究的国民性,也就是他界定的作为某一社会文化体系所特有的“众数人格”(modal personality)^②,即某个社会中分布的持久的性格特点或模式。英格尔斯对“国民性”这一饱含争议也经常被认为难以准确把握的问题的经典研究,使人们认识到不同社会国民心态差异性的重要,更使人们具备了研究这一差异性的信心。因此,我们可以接续民国以来的国民性批判与反思的话题,结合当下中国农民的实际状况,更多地从客观平和的立场,并在英格尔斯所作的“国民性”研究的路数下,进一步推进农民政治心理的研究。

其二,政治文化范式。西方对政治文化的关心,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社会学,甚至是启蒙时代,但其真正成为政治学研究的

① 樊星:《当代文学中的“农民性”问题》,载《文史哲》2009年第6期。

② 在英格尔斯的表述中,与“众数人格”同样含义的还有“社会性格”“基本人格结构”。在英格尔斯的中文译本中,译者对“众数人格”的解释是“每一种文化中人们共同具有的心理特征。众数人格是建立在心理统计基础上的一种实证分析,是指在统计分布上具有明显集中趋势点的心理特征值。众数是一个统计学概念,是一组数据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数值,代表数据的一般水平,众数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多个。”参见[美]英格尔斯:《国民性:心理—社会的视角》(王今一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一种理论视野,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勃林特(M. Brint)将西方政治文化研究追溯到三个源头:一是从孟德斯鸠到托克维尔的法国社会学研究传统;二是从康德到韦伯的德国文化哲学传统;三是二战后在美国政治科学领域中形成的对政治文化的“科学”或“行为功能”研究法。^①我国政治学界一般都将阿尔蒙德认作政治文化实证研究的首倡者和代表者。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的界定也得到国内学界的普遍采用,即“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②。阿尔蒙德所作的《公民文化》研究,更成为国内学者进行相关实证研究的参考范本。自阿尔蒙德之后,政治文化与政治价值的变迁,一直是西方政治科学界中颇受欢迎,但同时也饱含争议的学术议题。起初的政治文化实证研究,之所以引起人们的重视,是因为学者们假设了政治文化与民主表现或政治稳定之间的因果联系,因此政治文化问题显得非常重要。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西方社会科学界左派思潮和马克思主义研究风气盛行,政治文化研究的方向与焦点,转移到葛兰西的“文化霸权”^③理论,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④等以政治哲学为基础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末,政治文化的实证研究在西方社会科学界又重新崛起,不过此时学者的研究对象多是新兴的民主国家,学者们重点关注的是这些国家在政治文化上的变迁,尤其是民主支持程度、民主的正当性基础以及民主价值发展等议题,而且进行了一系列的跨国比较调查研究。国内学者比较熟悉的包括英格尔哈特主持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和以东亚十三国为对象的“亚洲民主趋向调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与此相呼应,国内政治学者也有人明确主张“把政治文化找回来”^⑤。

① Michael Brint, *A Genealogy of Political Culture*, Westview, 1991. 此书的中译本《政治文化的谱系》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

② [美]阿尔蒙德等:《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

③ 转引自罗钢等:《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④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⑤ 徐湘林:《把政治文化找回来——“公民文化”的理论和经验反思》,载《政治学研究》2012年第2期。